

## 《古诗十九首》中文人心态转变探究

韩亭亭

(广西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鉴赏《古诗十九首》，站在作者的角度揣测作者的写作目的，本文的写作视角，是《古诗十九首》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通过发掘东汉文人心态的独特之处，对比不同时期文人的心态，揭示这一时期文人心态的转变。笔者将本文分为两个部分，通过纵向比较文人心态的方法来揭示文人心态转变表现的三个方面：生命意识、享乐意识、个体意识，即本文的第一部分，这是研究的重点所在和较具新意的部分。本文的第二部分深入剖析《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背景，从政治、自然、思想的角度，揭示文人心态转变的原因。本文力图揭示文人心态转变的表现及原因，引起公众对汉代文人心态的重视。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心态转变；东汉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古诗十九首》是一些未留下姓名的汉代文人的作品，其内容不外乎通过展现游子、思妇的生活状态，委婉含蓄、深沉曲折地抒发他们的羁旅情怀、闺人怨别。《古诗十九首》不仅在抒情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烙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代文人心态转变的轨迹。本文就是基于此观点展开论述。

作为一个整体，这十九首古诗收录在《文选》中，历来受到颇高的赞赏和评价，并且对其进行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文学在魏晋时期进入自觉时代，与汉魏之际文人心态的转变密不可分，即“文学的自觉”离不开“文人的自觉”，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古诗十九首》中的大部分诗歌都反映了文人的这种自觉，这种自觉与文人心态的转变息息相关。笔者认为，一个时代必将影响一代文人，影响一代思潮，时局动荡的东汉，有适宜《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气候与土壤，物质和精神双重层次上都给其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在政治混乱、经济衰退、思想繁杂的汉末，文人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地位上发生的改变渗透进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在塑造一种新的文人心态。宦游经历让他们在清楚地看到社会的黑暗面后，舔伤之余，也对生命和自我都有了超越于以往的认识。相比于先秦时期的文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生活和生命重新打量，其心态与在此之前的文人心态相比别开生面，也有别于后世，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先声。文人心态的转变直接影响文学的进程，因此对于《古诗十九首》文人心态的研究很有必要。

至今为止，对于《古诗十九首》的传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十九首古诗的作者和产生的时代，美学风格，诗学主题，抒情艺术等几个方面，比如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初探》、赵敏俐先生的《两汉诗歌研究》等，对于十九首古诗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前人的不懈努力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来研究文人心态的作品也不乏佳作，如王有景的《〈古诗十九首〉与东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王轶群的《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王莎莎的《论〈古诗十九首〉表现的生命意识》等，这些作品对于本文的写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研究文人心态转变的问题上是不能不虚心考察的佳作。本文力求在突出文人心态转变的突出表现，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 一、文人心态转变的表现

#### (一) 生命意识：人生忽如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sup>①</sup>庄子也曾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sup>②</sup>这些语录证明，在汉代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时间的转瞬即逝和生命的难能可贵。在《古诗十九首》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诗歌内容、揣测作者心态发现，汉代言人的这种生命意识变得更加清醒，更加理性，更加成熟。在求取功名的旅途中，他们意识到“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sup>③</sup>天地虽然很广阔，汉代人却无安身之处，四时也在不知疲倦的交替，人生何其短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sup>[3]</sup>在这些文人眼中，人的一生如寄于天地之间的过客，不像金石能够长久的存留于世，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并且只有短暂的一世，卑微如尘土，在刹那间便可随风飘散。这些形象的比喻并非是作者为了写诗而作，而是作者们在历经现实苦痛后的深刻体会，生命不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自己的命运不能由自身主宰，这种深层的悲哀在《古诗十九首》中流露出来。<sup>[2]</sup>

正是因为生命意识的觉醒，这些文人们哀叹生命的短暂、惧怕死亡的降临，但同时又不盲目依靠求仙、问药来求取长生，永世不朽。如《驱车上东门》，在这首诗中，作者驾车登上东门，远远地望见城北的墓地，萧瑟的长风摇摆着白杨树的枝条，松树和柏树站立在墓地两侧。陵墓之下沉睡的是早已逝去的先人，人的离世就像坠落无尽的长夜，永远在黑暗中，千万年也无法醒来。人的一生，像早晨的露水，经不起太阳的蒸晒，顷刻便消失殆尽。作者在诗中十分鲜明地表现出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对于死亡的逃避，这两种态度其实共同揭示同一个问题，同样都表达了作者的生命意识。“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更是让世人看到汉代言人心态的成熟：他们不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人的生老病死是恒定不变的规律这个事实。金石坚固硬朗，可以经得起碰撞跌打，而人却是很脆弱的，经不起多少挫折，还要历经生老病死，世人无一例外，即使是圣贤之人也要遵循生命的规律，服药以求成仙可能会误入歧途，因此不是可取之道。可以说他们对于生、死以及长生都有了比前人更加理性的认识。这些文人们思考如何看待生与死的问题，在《古诗十九首》中感叹生命的短促，表达对死亡不可避免的厌恶，试图洞察宇宙人生的奥秘，这虽然不是全新的，但是却是另一种新的气象。在此之后，这种主题类型的诗歌越来越多，如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等，可以说《古诗十九首》是生死主题诗的直接源头。

## （二）享乐意识：为乐当及时

面对人生短暂、生命无常的痛苦与无奈，《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提出一种消解痛苦的方式。以我们的价值观来看，这种方式是消极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千岁忧”和“不满百”形成对比，在突出“千岁忧”的同时，又点明“爱惜费”和求仙是“千岁忧”和不能及时行乐的原因，“愚者”才会“千岁忧”、“爱惜费”和求仙，含蓄地把消极的及时行乐变成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既然生命的长度有限，为什么要让自己的生命充满忧愁呢？为什么不“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呢？即使酒菜不比美酒佳肴，即使驾着破车、驱赶劣马，照样内心愉快地阅尽繁华。无法通过服药求仙来延长生命，那么就让自己这仅有的一生在潇洒、狂放中度过。“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对酒当歌，参加宴会，豪爽畅饮，不因自身贫贱而满怀悲慨，不因仕途失意而饱受煎熬，极度渴望跃居要位，那么就尽自己的全部力量获得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赢得享受富贵荣华的机会。“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自然界中的万物都随时光腐朽、消散，“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为什么不敞开心扉、丢掉烦恼，为生命增添亮丽的色调呢？“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求取功名的路途如此漫长、艰辛，压抑

<sup>①</sup>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82页。

<sup>②</sup>庄子[M]孙雍长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284页。

<sup>③</sup>本文中《古诗十九首》诗句均引自(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409页-412页。

的现实让汉代的士人不得不在礼教与世俗中徘徊、游荡，最终走向美酒、丝竹与佳人。这些诗人们也想在官场上有所建树，扬名立万，但是官场倾轧、同窗背离等现状令这些文人心灰意冷，转而通过享乐来驱散心头的烦恼。《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似乎失去了对抱负的那种屈原式的执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似乎在这个时代并不会受到大多数文人的推崇。或许他们内心深处虽然也想坚定地走一条路，但是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这些文人机会施展抱负，他们只好立足当下、及时行乐来排遣愁苦。在建安时代，这种及时行乐的咏叹不再如此大摇大摆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因为文人的际遇相比汉代较好，他们心有余力关注民生疾苦，积极地建功立业，于是慷慨豪迈的文学作品取而代之，登上文坛为中国文学史树立起了又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 （三）个体意识：努力加餐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价值观正体现了汉代言人的自主意识。他们的理想是通过政治才能来兼济天下，可是现实却逼着他们“独善其身”，以往的文人们似乎忽略了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事实，忙于国家大事、民族道义而无暇自顾。而这十九首古诗的作者们追求自我个性人格，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的约束。生命是短暂的，要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内报效朝廷、体恤黎民、孝敬双亲、守护妻儿，没有哪个人能够做到全面到位。的确，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应该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创造价值，在这之前的时代，不乏一心投身江山黎民的士大夫，我们也看到无数心系年迈双亲的游子和整日以泪洗面的闺房少妇，这样“忘我”的传统形象在人们心中已经固化下来，而且我们也觉得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也是理所当然。《诗经·小雅·采薇》等描写战争的作品，表现了与敌人交战时的感受：厌恶战争，思念家乡，但又自觉地在宗族、血缘和伦理情感的作用下把国事摆在最高位置，认为赴国难是一种英勇壮举。屈原在政治失意、流放异乡时心心念念的仍是对楚国的拳拳赤子之情，在宗法意识的作用下并未提到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儿女。我们会感觉到这些人物虽然很伟大，带有光环，但是我们会认为，这些并不是人物的全貌，不是完全真实的。汉人提供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价值参照体系，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与此前不同，《战城南》与李陵的《别歌》等作品鲜明的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和个体生命牺牲的哀念。《古诗十九首》中虽然没有描写战争的诗，不能与《诗经》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强调了个体生命的宝贵，诗人们并未因为宗法制度等约束来克制自己的私人情感，个体意识的流露会给这些人物增添真实感。虽然社会的黑暗让这些人产生一种生命难以把握之感，但不可否认，生命确实是自己的，是神圣的，是不附属于任何东西的，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一种自认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好男儿志在四方，四处游历、寻求官职，仕途不顺利让文人很有挫败感，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欢饮达旦、寻欢作乐来消解人生苦痛。游子常年在外，定有不少思念亲人和故乡的作品。《诗经》中也有很多流露思念父母的诗歌，如《小雅·四牡》、《小雅·蓼莪》等。而在汉代表现思念双亲的作品很少，表现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的作品多了起来。并且这种表达离别伤感的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的很鲜明，如《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庭中有奇树》《客从远方来》等。此外，在之前的作品中，闺中少妇的形象似乎早已定格，她们总是那样哀怨、惆怅，她们存在的价值似乎也只是为了远在天边的游子，如《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刻画了翘首盼郎归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悦己者不在，就不会在乎容貌如何，也未察觉人生短促、盛年难再。她们自觉地把自已与爱人看做一体，失去了自我，把自己存在的价值寄托在心上人那里。而在《古诗十九首》中，同是思妇，这里的女子却活得很理智。“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女主猜测游子已经移情别恋，两人的相会也遥遥无期，望穿秋水的思念没有盼来游子的归来，得到的却是岁月留给自己容颜的印记，再怎么诉说相思也没有用。“努力加餐饭”，可能是对远方之人的关心，也有可能是思妇的自勉，不管结果如何，还是要爱惜自己。“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番言论惊世骇俗，把一个女性的心事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更是表现了一个个性十足的女性的生命意识。“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张玉谷说其“代揣彼心，自安己

分”，女子相信男子一定会来，何必哀怨呢？《冉冉孤生竹》这首诗虽然也表现了一种传统的婚姻观，即女子结婚后才算是找到终身依靠，但是同时也以花喻人，告诉我们女人的青春也是有保质期的，希望个体的爱和美受到重视。在那个时代，女子本应寄希望于婚姻这把锁，这首诗中的女子却是将希望寄托于游子个人品格的高洁，“人”的存在感高于世俗的束缚。这些作品的作者并不是女子，很可能是汉代的一些文人站在女子的立场上猜测女子的心事，这种揣测完全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不可否认，这些思妇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文人的气质，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他们并不认为为国捐躯是理所当然，“女为悦己者容”也不应是当时女子的人生信条。他们相互独立的个体意识比较明显，渴望人格尊严得到维护，也都不同程度地追求自我价值，重视自身生命，开始看到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sup>[1]</sup>

## 二、文人心态转变的原因

《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和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叶嘉莹先生在综合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徐陵的《玉台新咏》和钟嵘的《诗品》后，并结合为《昭明文选》作注的李善的说法认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sup>①</sup>《古诗十九首》并非一人一时之作，根据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古诗十九首》最迟在桓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所生活的时代应是东汉。<sup>②</sup>创作年代和作者的确定对于本文展开的论述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时代背景就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土壤，东汉的现实社会和多元的文化思想，必然作为一种养分为《古诗十九首》所吸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文人的精神世界并通过文学作品展现出来。东汉政局混乱，宦官、外戚干政，皇帝与文人的沟通受阻，文人士子的地位下降，因此《古诗十九首》中的文人们普遍以及时行乐的心态来回应黑暗现实带给他们的苦痛。自然灾害、外寇入侵，天灾人祸不断，文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短促、生命可贵，因而更加重视自己的个体价值。此时儒家所倡导的“温柔敦厚”之旨，其教化作用并不能使文人减轻痛苦，老庄哲学和儒学混合产物——玄学，却给文人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风港湾。这一切都综合作用于东汉文人的心灵，给文人心态的转变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 （一）政坛失意

寒士的不平早在战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所反映，如《楚辞》中宋玉的《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较早地道出了失意士子的心声。《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若若飏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同样是政治上不得志，这首诗表达了士子渴望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青青陵上柏》也比较清晰地展示了失意之士的心声，并且能够折射当时的背景，发人深省。此诗的前半部分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后半部分表达对有权有势者奢华生活的不满。人生的短促没有让作者发出曹操《龟虽寿》中的那种积极处世的感慨，而是引出无奈下的斗酒娱乐。“驱车策弩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热闹非凡的洛阳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冠带人物，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非常奢华：众多的宅第，雄伟的宫阙和穷奢极欲的宴会。他们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的注意呢？因为这些冠带人物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士子的命运。通过阅读史书我们了解到，在东汉后期，最有权势的便是当时的宦官、外戚和贵族豪门，即诗中的冠带人物。到宛与洛的士子大都是为求取功名，赢得功名利禄。洛阳作为当时文人眼中的进阶圣地，本来应是文人士子大显身手的舞台，洛阳留给诗人最深刻的印象却是“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上层社会自相往来，跻身高层渺无希望，这不能不让作者寒心。西汉的外戚干政导致了王莽代汉，东汉的君主力避重蹈覆辙，但历史证明，宦官、外戚争权夺利在东汉并未休止。从东汉和帝起，“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

<sup>①</sup>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76页。

<sup>②</sup>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目前还存在争议，此处笔者揣测诗人的生活年代大致应是在东汉。

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sup>①</sup>光武帝“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规定失去了作用，年轻的太后们处理政事不力，只得依靠父兄势力，外戚干政卷土重来。到桓帝时，外戚积患已久，小皇帝在深宫中成长，渴望获得属于自己的势力却又势单力薄，只得与宦官这个天然联盟结合来争夺政权。外戚与宦官的势力此消彼长，政局一片混乱，文人们虽然没有卷入政治漩涡的暴风眼，但是也或多或少受到牵连，成为高层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汉朝实行察举制度，很多学子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选官制度激起了很多文人的从政热情，很多文人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四处游学求得高官赏识，游学途中不免产生一种漂泊感，因此对四季的更替和时间的流逝特别敏感。入仕为官的机会很难得，当时宦官、外戚对敢于直言进谏的赤诚之士采取污蔑、残害的手段，卖官鬻爵成风，“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释贤取愚”。<sup>②</sup>“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婞直之风，于斯行矣。”<sup>③</sup>加之“冠带自相索”，豪门贵族自相往来，朋比为奸、结党营私，所以更多文人被拒于门外，“幸进者少，失意者多”，文人学士们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各党派的争权夺利，让文人更加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文人士子在这个时代收到了冷落。春秋战国时期，文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便可有扬名立万的机会，各诸侯国国君也都采取“得罪一士，社稷其危”的态度，文人士子享有较为优厚的社会地位，即使政见不被采纳或者物质生活贫困，他们总的来说是有很高的参政热情，非常的执着进取。但是东汉的政局不能给文人士子该有的尊重、待遇，所以他们的参政热情比前不及春秋战国之士积极，比后又不如魏晋之士昂扬进取。《行行重行行》写游子思妇的离乱忧愁，同时也被后人解释为“忠臣被谏之作”。如李善在为此诗作注时说：“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反也。”<sup>④</sup>方廷珪：此为忠人放逐，贤妇被弃，作不忘欲返之词。<sup>⑤</sup>可见，文人士子对于朝廷多少有点失望，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在《明月皎夜光》中，昔日共同奋斗的同僚在飞黄腾达之后将过往的情谊忘却，更增加失意文人的惆怅而感叹知音难遇。仕途坎坷，生活窘迫，又没有知音可以倾诉，物质和精神上都倍受煎熬，对于文人来说在这个时代的处境这是很窘迫的。《青青陵上柏》便是当时政治的一个缩影。正因为看清楚了这残酷的现实，所以《古诗十九首》中普遍存在一种消极的及时行乐的心态。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消极的表现正是他们渴望被重用、跻身高阶的愿望无法实现的无奈之举。

## （二）天灾人祸带来对生命的珍视

东汉文人对于时光飞逝、生命短暂的体会似乎更加深刻，因为在当时除了政治上的不如意，人们还必须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据《后汉书·孝桓帝纪第七》<sup>[4]</sup>载：“（本初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永兴元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冀州尤甚。”地震、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如此的频繁，农业必然受到影响，庄稼歉收，人们颠沛流离。外来入侵者引发的征战使人们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恶劣，百姓的生命如蝼蚁，被轻易地毁灭。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又怎能不骚动多情文人热爱生命的笔端呢？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记录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笔端沉淀自己对于生命的思考。经历是一笔财富，生命无常，光阴易逝，东汉的文人士子在人生浮沉中已看透这恒久的定律，所以他们的人生观较之前人更加通透，对于生命和生活也更加珍惜。

## （三）精神因素

<sup>①</sup>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6页。

<sup>②</sup>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740页。

<sup>③</sup>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638页。

<sup>④</sup>（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409页。

<sup>⑤</sup>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5.卷二笺注其一。

当“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走不通时，文人们开始迷茫。《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实现人生“三不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有可能的，士子们做到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便有可能受到朝廷重用，实现人生价值，成就自己的理想。但是，时代对汉代文人们的要求提高了，即使他们才华横溢也有可能无用武之地，仕途坎坷，生活落魄。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却使得文人士子不再对儒家学仕结合的人生模式深信不疑。儒家的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与遵循，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诗歌难免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而变得质木无文。元人陈绎曾指出《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诗谱》），到了东汉，人们开始突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约束，毫不避讳对于功名利禄的渴求和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追求自我的人生价值。“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sup>①</sup>虽然人们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整套理论，但无疑，儒家的一些观点确实经不起时代检验而被人们丢进历史的隧道。同时，正处于上升时期的玄学对于文人心态的变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中金石永恒与人生有限的对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提醒我们珍重当下、及时行乐，“思君令人老”揭示生命周期与心态之间的关系，“去者日以疏，来者日已亲”告诉我们富有哲理的社交经验，《古诗十九首》中还有不少诗流露出的敏锐的节序感，这些充满哲理的诗句闪耀着古人的智慧，是典型的玄学时间观、空间观和节序感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中表现出来的心态转变，受到当时环境的深入影响而产生，这些进步的思想深入浸透文人的心灵，体现出这个时期文人独特的个体生命意识，给我们了解文人心态转变轨迹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并且这种心态的转变对后世文学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于这个角度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本篇论文的写作，笔者也有很深的感触。作为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我们不仅要做到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在时代潮流中积极地思考人生、用笔记录思维火花也很重要。文人不能只是知识的储存器、搬运工、传播者，更应努力成为各个时代的传声筒和镜子，表达出“人”这种高级动物对于时代的独特感受。

#### 参考文献

- [1] 李红霞, 彭晓敏. 女性自我价值之觉醒——《古诗十九首》和《诗经》思妇形象之比较[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1: 304-305.
- [2] 王有景. 《古诗十九首》与东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J].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 20(3): 162-166.
- [3] (梁) 萧统编, (唐) 李善注.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09-412.
- [4] (宋)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5] 赵敏俐. 两汉诗歌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76-127.
- [6] 胡大雷. 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0-39.
- [7] 李祥伟. 走向经典之路: <古诗十九首> 阐释史研究[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sup>①</sup>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92 页.

- [8]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88-105.
- [9] 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10] 周振甫.古代诗词三十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320-329.
- [11]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8-96.
- [12] 张莎莎.论《古诗十九首》表现的生命意识 [D]. 云南大学, 2012.

## Study on the Change of Chinese Mentality in *Nineteen Ancient Poems*

Han Tingting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surmise the author's purpose of writing standing in the point of the author's view by analyz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The writing persp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he attitude towards life, which reflected in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By finding the unique mentalit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literati, comparing different mentalities of wri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I reveal the change of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i in this period. This paper, which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s going to reveal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i change embodied through th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method: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i life consciousness and hedonism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and is also the focus and innovative part of this paper.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nature and ideology revealing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i.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performance and reasons of the change of the mentality of the literati.

**Keywords:** *Nineteen Ancient Poems*; Changes of Mentality;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作者简介:**韩婷婷(1994-),河南安阳人。广西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